



浓浓故乡情，拳拳赤子心

——温岭经济社会发展杭州顾问团服务家乡纪事

狄绍梅/文

2005年1月16日，省人民大会堂灯光格外明亮。温岭市委、市政府在此召开杭州市温岭商会与温岭经济社会发展杭州顾问团成立大会，王建平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郑重宣布：狄绍梅任顾问团团长，胡小泉、叶兴祥任副团长。当那份印着鲜红印章的聘书递到手中时，我忽然明白，这份信任背后，是家乡对在外游子最深切的期盼。后来才知，时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邦勤为顾问团的定名、聘书设计乃至经费落实倾注了心血——正是他的精心谋划，让这个特殊的组织从一开始就深深扎根于故乡热土。

温岭经济社会发展杭州顾问团，从诞生起就带着鲜明特质：业余却不敷衍，松散却有合力，非功利却成效显著。这个由28位温岭籍厅局长与80多位县处级干部组成的团队，肩上扛着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的重任。2008年，陈伟义书记提出“有进有出”的建设理念，团长会议据此定下规矩：厅级干部长期留任，处级干部退休后不再担任，新任提正处级干部补充进来。这份动态调整的智慧，让顾问团始终保持活力——到2025年，团内已有副厅级以上干部58人（在职30人、离退休28人），在职正处级干部60人，总计118人的队伍，依然延续着20年前那份对故土的赤诚。

二十载春秋，顾问团的足迹早已深深印在温岭发展的年轮里。

引进香港资金建设耀达国际大酒店，是我们为家乡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从1998年开始，我五次陪同香港浙江同乡会副会长占耀良先生到温岭考察，历经三任市长接力，终于在王建平市长任上敲定这项投资2000万美元的项目。当这家五星级酒店在市中心崛起时，它不仅是城市地标，更像一扇窗，让外界看到了温岭开放发展的决心。

金融活则经济活。在顾问团成员、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陈国平的推动下，温岭诞生了第一家本土银行——民泰商业银行。这家县级银行的创立，打破了当时的金融壁垒，为家乡民营经济的注入源头活水，更开创了县域金融改革的先例。此后其分行遍布浙江大地，每年上缴温岭财政二三十亿元。

农业现代化的路上，顾问团同样未曾缺席。原省人大常委、省农科院副院长叶兴祥与朱云富副主任牵头，促成省农科院与温岭的市院合作。研究员张冬青带着她的高油酸油菜籽产业化项目落户，浙江农村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随之成立，松门、箬横的万亩生产基地里，高油酸油菜籽扎下了根。每当东海塘的5000亩油菜花盛开，那片金色海洋总能引来如织人潮，成为台州爆火的赏花期。

张冬青团队研发的品种，油酸含量高达83.4%，超过茶油与橄榄油，这项通过国家审定的成果，让曾经是省粮食局副局长的我，满怀期待——若能大面积推广，或许能改写中国人的食用油格局。彼时，她研发的保健食用油确实供不应求。可惜，后来项目生变，科研成果推广受阻，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省农业厅童日辉处长（后提任省供销社副主

任）等顾问团成员，还为温岭引进了水稻、菌类及黄秋葵等优质品种，帮助发展“种子产业”，改善种子品质。在为温岭争取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时，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最终让温岭多乐佳公司成为当地第一家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乡镇发展的每一步，也浸透着顾问团的心血。2008年，省广电集团张雨雁主任，指导新河镇申报全省十大特色小镇，不仅帮家乡赢得荣誉，更争取到相当于二三百万元的免费广告资源，省台还指派主持人无偿担任代言人。次年，他又为滨海镇拿下同样的称号，组织省城媒体集中采访镇委书记戴美忠，让家乡的故事传遍浙江。2011年，泽国镇申报全省25个小城市培育镇时，我们更是全员发力，叶兴祥、陈朝华、陈春玉等成员反复商议，向省发改委据理力争，让泽国与临海杜桥一同拿下台州仅有的两个名额。

让温岭企业走向世界，是我们的另一重使命。横峰企业家金海慧在乌干达创办龙氏集团时，杭州警备区原司令胡小泉、省工商联原副会长郑明治曾帮助接待当地市长。郑明治用流利的英语介绍温岭的场景，让乌干达市长既惊讶又感动，承诺回国后全力支持龙氏集团发展。2011年9月，我还精心组织民营企业家蔡美德、狄夏芳、陈林友、朱永增，以及临海种粮大户、全国劳动模范周振华走出国门，聘请姜雯为翻译，赴哈萨克斯坦考察。在前苏联时期的一个国有农场，我们看到数万亩土地荒芜，杂草丛生，机耕路、灌溉渠道等设施，历经20年风吹雨打已成废物。这景象，既让人感慨昔日昌盛，也让周振华想租地种大豆的念头打了折扣——他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回国后，我给省政府写了报告，建议把浙江的粮食基地建到哈萨克斯坦去。而蔡美德、狄夏芳则结交了哈国朋友做起了跨国生意。让世界了解温岭，让温岭走向世界，这便是我们的初心。

最难忘的，是为家乡百姓排忧解难的日子。每年数百位乡亲来杭求医、求学，顾问团成员总能热情相助，尤其是副秘书长阮永斌、刘斌总是热忱有加。省政协副主席、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更是以全局的高度，主动联系温岭，不仅派专家团队定期坐诊，让家乡人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还直接与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确保邵逸夫医院的资源长期为温岭人民服务。至今，温岭群众提起顾问团的蔡院长，都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

在振兴教育上，顾问团同样全力以赴。2012年的教育座谈会上，我们专门邀请浙师大的基础教育专家和杭二中校长叶翠微作专题报告，顾问团内的教育家——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梅新林、省教育考试院叶宏书记以及省文化厅副厅长连晓鸣、省医学科学院书记张云东都作了精彩发言。周先苗和李斌市长还现场互动交流。会后，省工商联领导郑明治等顾问团成员，为温岭市第八中学捐款10万元。

2014年，在省委委员、浙工大党委书记梅新林的积极推动下，浙工大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潘柏松创建了浙江工业大学温岭研究院。十年来，为温岭先后引进“500精英计划”高端人才10余人，帮助4家企业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引进博士后人才5人。潘柏松教授带领团队走访泵与电机、汽摩

配、机床工具等产业的百余家企业，精准把脉需求，量身定制转型升级方案，推进温岭产业创新与数字化转型。针对企业痛点，他们研发的精密装备制造技术、质量集成数字化系统、工业互联网技术等成果，已在50余家企业应用转化；举办了30余次讲座，让近3000人受益。潘柏松也因此被推荐为2023年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台州站火炬手。省机电集团副总陈存法，多次接待温岭市政府领导带队来杭考察调研职业教育工作，着力推进集团所属院校和科研院所与温岭企业的对接交流，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助力家乡经济社会发展。

顾问团还曾帮助一位“奇人”成就大业。温岭石塘书生李建国，五龙书院院长，早在21世纪初便独辟蹊径，携手浙江大学踏上了养殖大熊猫、朱鹮、金丝猴、麋鹿这四大濒危珍稀动物之路。他手中握着国家林业部颁发的中国第一张民间养殖濒危珍稀动物证书，至今仍是唯一。

那时，我任顾问团团长，他任温岭杭州商会党支部书记。这份事关未来的崇高事业，值得我倾尽全力支持。那些年，我陪他与临安县政府协商，踏遍青山找地块、建基地、筹展馆，还请杭州市委王平书记题写“国家濒危珍稀动物养殖基地”碑名，至今想来仍觉分量千钧。

关于大熊猫馆的选址，曾有过一番斟酌：临安虽有基础，但杭州动物园已有熊猫，且当地人口稀疏；温岭作为浙东重要县城，辐射力更强。后来，三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落户温岭长屿洞天，果然掀起了“熊猫狂潮”——不仅轰动台州，连温州乐清百姓都专程赶来，长屿洞天成了浙东南最热闹的所在。这场热潮不仅带动了温岭的旅游，更在潜移默化中唤醒了更多人对濒危动物的保护意识，这或许是比经济效益更珍贵的收获。

而临安板桥的麋鹿养殖基地，却走着一条更崎岖的路径。随着规模扩大，经济压力与日俱增——麋鹿身为保护动物，既不能宰杀也不能售卖，国家主办尚可依托财政支撑，民办机构要长久维系，必须找到公益与生存的平衡点。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保护濒危动物从来不是简单的“养起来”，更要解决“养下去”的可持续性难题。李建国老师为此日夜焦灼，邀我一同拜访胡庆余堂的刘俊董事长与任海斌副总，探索麋鹿角入食、入药的可能性。这条路走得曲折，辗转澳门、香港，终于为麋鹿的生存打开了一扇门：一款以麋鹿角为原料的保健食品饮料已在香港上市，胡庆余堂加工厂也即将投产相关药用新产品。

回望这段历程，从大熊猫落户温岭引发的保护热潮，到麋鹿养殖探索市场化生存路径，其实都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人类该如何与濒危生命共生？民办机构的探索尤为珍贵——它不像国家主办那般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却倒逼出更具韧性的生存智慧。当熊猫馆前的人潮让更多人懂得“守护”二字的分量，当麋鹿产品在市场流通中实现“保护即可持续”，这份事业便超越了地域与物种的界限，成为人类对自然最真诚的承诺。

二十年来，赵一德、李卫宁、蔡秀军、诸葛彩华4位省部级同志，以及中科院陈云敏院士，始终牢记顾问团的“智囊”职责，积极助力温岭市委、市政府擘画发展蓝图。围绕城市定位、植物园及主题文化公园建设等关键议题，我们多次组织专题研

讨活动。他们即便工作繁忙，也尽可能抽出时间参加。例如，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的赵一德，在完成重要接待任务后，仍匆匆赶赴顾问团会场。尽管彼时会议已临近尾声，他还是坚持与大家见面，并为自己的迟到表达歉意。

在系列研讨会上，大家结合市政协副主席林邦勤在《温岭日报》发表的关于阳光文化与石文化的两篇文章，展开了深入探讨。时任省监察厅副厅长的杨夏柏、省质监局局长瞿素芬、省文联副主席曹鸿、浙江老年报总编林妙春等数十位领导，基于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结合实际深入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阳光文化与石文化是温岭独有的城市基因：阳光文化展现出温暖包容的特质，石文化则承载着坚韧厚重的内涵，二者在温岭的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尊”地位，是推动城市发展、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根基。

基于这样的共识，大家遵循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相统一、相协调的原则，将这两大文化元素具象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感悟”的标志性载体：既要打造国内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公园，承载历史积淀、映照文化根脉，又要以之昭示未来，彰显温岭的文化创造力。由此提炼出的“磐石般坚韧，阳光般温暖”城市精神，更成为这份文化共识的凝练表达。

为将文化公园打造成精品，规划设计始终坚持“高站位、远视野”：钟楼、太阳神钟、桥梁等建筑的设计及“铭文”撰写，均力邀大师参与、名家镌刻，力避模仿复制与建设趋同，务求打造成“百年古迹、千年文物”之永久地标。

与此同时，顾问团建议将“新年曙光节‘与’岩洞音乐节”确定为固定节庆，以持续擦亮城市文化名片。温岭籍当代著名诗人余文法，特以长诗《温岭曙光钟塔畅想》寄寓深情；中国雕塑家协会会长吴为山领衔设计的曙光文化公园方案视频，也由叶海燕、周先苗等三任市委书记带队，会同市人大、政府、政协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审议，力求凝聚起上下同心的建设共识。

二十载光阴流转，从经济破局到农业转型，从民生保障到文化守护，顾问团的每一步奔走都源于对故土的赤诚。这份付出从未被视作任务，却在一次次躬身实践中，让“故乡”二字的分量愈发清晰——它不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更是需要用一生反哺的根脉。

项目的成败、成果的得失，终将随时间淡去，但这份跨越二十年的守望，早已成为温岭精神的生动延续。

作者狄绍梅曾任临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黄岩县委副书记、临海市委书记、省粮食局副局长。



番薯叶

陈洁婷/文

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坐落在海山农村的山冈头，她家有几亩薄田，平时种些蔬菜粮食，自给自足。外婆种的最多的菜是我们常见的芥菜，芥菜根茎粗壮，适合腌制，方言叫“噶菜”。外婆会把芥菜的叶子都去掉，留下它的根茎，用盐水腌制起来，做下饭菜。那时候，物资不丰富，农村没有其他菜肴，就吃腌制的芥菜。那个年代没有冰箱，腌制好的芥菜时间长了便会发臭，有一股浓浓的臭味。但是，我们饭桌上还是离不开它。

除了种芥菜，外婆还种豆荚和番薯。在深秋番薯成熟的时节，外婆就会去收番薯。收番薯是一件劳动强度很大的活，不仅要挖埋在地里的番薯，还要收割长在地上的藤蔓。那时，我和表弟年纪尚小，但我们都会去帮忙。表弟和我同岁，仅小我几个月，小时候我们都会干些农活：摘猪

草，挖蚯蚓喂鸡。但我身子单薄，又加上视力不好，外婆便不让我们帮忙，但我会吵着嚷着要和表弟一起去。外婆拗不过我，就让我们挑番薯藤。外婆把番薯藤割下，捆成一捆一捆，放在田地的一边，我和表弟就把它用扁担挑回家。番薯种得多，番薯藤堆得也多，我们踉踉跄跄一趟又一趟地挑，一趟就是一个下午。

番薯藤我们农村人吃，都会给猪做饲料。番薯一部分留着鲜吃，烧番薯粥、番薯汤、番薯羹，还做番薯圆。番薯羹就是在烧面和糕时放入番薯，咸咸的面糕里加上甜甜的番薯作佐料，甜甜咸咸，特别好吃，这是我们海山农村人特别的吃法。

大部分番薯会被做成番薯丝保存起来。番薯不容易储藏，但番薯丝可以。大人会把番薯放在水里洗净去皮，然后用刨子刨成丝条状，晒在竹席上晾干。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刨番薯丝，一排排竹席一字排开，蔚为壮观。刨番薯丝的日子是热闹的日子，大人们凑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讲白搭”。孩子们

也不闲着，上蹿下跳，这是农忙时节。

外婆还会拿出几个品相好的番薯给我们做番薯干，做成零食解馋。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番薯干就是百吃不厌的美味。番薯先要在锅里煮熟，然后用刀切成薄薄的片状，再在阳光下晒干。番薯干晒干要好几天时间。晒得全干的番薯干虽然容易保存，但太有嚼劲有点干涩；晒得半干的番薯干又软又糯，小孩子等不及，会一边晒一边偷吃。等到晒得全干，也就所剩无几了。

大概等到我读初中的时候才有人吃番薯叶。我们海山的农村人会用番薯叶炒米线，这是一道美味。番薯叶洗净加猪肉、鳃鳃等佐料直接和米线炒，炒出来的米线特别入味，有番薯叶的浓香。但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说番薯叶有微毒，吃多了对健康不利。这个说法就像入秋茄子有毒，开白花的蔬菜是发物，大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也就不经常做。

后来很多年过去了，我长大结婚成家。我嫁到了同一个市区但和我娘家吃法迥然不同的乡镇。他们不靠海，也没有肉羹、带鱼猪肉饭、番薯羹。他们的番薯叶不炒米线，要下米线，并且要把叶子摘干净，每一条茎的膜都去掉，留下鲜嫩嫩的茎下米线。但是我吃不习惯。我喜欢吃番薯叶炒米线，叶子是它美味的灵魂。

现在吃番薯叶的人越来越多了，番薯叶成了一道普通的菜肴。听卖菜的农民说，现在有一种不长番薯专门长叶的番薯藤，它的叶子长得很快，摘了可以再长，周期很短，专门提供番薯叶作美食。母亲很喜欢买番薯叶做菜肴。她也没有番薯叶有微毒的忌口了。买一把番薯叶，不去皮摘叶，放点虾皮直接炒着吃，特别鲜甜的味道。我们全家人都爱吃，连我爱人也习惯了。

番薯叶伴随着我们走过长长的岁月，我悄悄地长大，慢慢地变老。不管用何种形式烹饪，它都是我们的最爱。